

國學叢書

曾國藩評傳

何貽焜編著
正中書局印行

—導言

居今日而探討曾文正公之生活與思想，爲作翔實之評傳，似非當務之急；蓋自曾公之卒，以迄今茲已六十餘年，此六十餘年中，世界之變遷固繁，吾國之興革尤劇；如不憚煩難，努力探討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即使有所創獲，亦有明日黃花之嫌，矧有否創獲，尚在可知與不可知之間耶？然則余胡爲不辭勞瘁，竟就力之所及，將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細爲探討？夷考厥因，舉其著者，約有數端：

自來品衡人物，不外褒貶二字，要在得其當而已。鄭板橋有言：「隔離搔癢，贊亦可厭；入木三分，罵亦可感；」洵爲通人之論。曾公一生，贊之者固多，毀之者亦復不少。吾人如以他人之毀譽爲毀譽，毫無自主之見解，斯則已矣。如欲纖洪備悉，是非不謬，則於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非有詳細之探討不可。此其一。

諺云：「時勢造英雄。」又云：「英雄造時勢。」蓋時勢與英雄，其關係至爲密切，竟互爲因果也。

曾公之爲人，以現代之眼光觀之，固非非常之人，亦無非常之功；然在當時，以一在籍侍郎，卒能削平

評傳曾公
之緣起

巨亂，其豐功偉烈，固有非常人之所能企及者。其所以成功，雖由時勢使然，要亦由於曾公有獨到之處，故能轉移風氣，改造時勢。不然，與曾公處同一時勢之下者，不知凡幾，胡爲類多默默無聞，竟讓曾公獨擅其美也？吾人考察曾公成功之原因，固應注重時勢，尤宜了解曾公之生平。欲了解曾公之生平，於其生活與思想，自非有詳盡之研究不可。此其二。

曾公一生，幾經艱苦，頻受折挫，故其生平箸述，類多經驗之言。近人如梁任公、蔡松坡、龍夢蓀、許嘯天等，以其言多可取，往往纂輯成書，壽諸梨棗，以供世好，其意良嘉；然僅見一斑，未窺全豹，片詞隻義，不足以概括曾公之生平。至最近胡哲敷君曾國藩治學方法、蔣星德君曾國藩之生平及事業，雖屬佳箸，然以不詳不盡，讀者猶有憾焉。余於曾公生平，極願盡力探討，蓋由於此。此其三。

凡人之思想，往往因時因地而不同，要與生活之情形，有密切之關係。即以曾公而論，少年之思想與老年之思想，固截然不同；京中之言論與軍中之言論，亦較然可分。吾人如不能了解曾公之生活，僅就其片詞隻義，予曾公以批評，固無是處；即就其整個之箸述，加以探討，如不能熟諳曾公之生活，亦不足闡明曾公思想之淵源及其轉變。余於曾公，不獨考察其思想，而且探討其生活，蓋惟能了解其生活，始能了解其思想也。此其四。

文物制度，固隨時而不同；性情意志，亦因人而互異；惟至理名言，精神器宇，則往往歷萬古而常

新經百世而罔替。曾公一生，不無可議之處；然就其嘉言懿行而論，則亦頗多可取。吾人倘能知所別擇，慎爲去取，其裨益吾人心身者，良非淺鮮，固不能以明日黃花之故，視若敝屣也。余於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不惜殫精竭慮，努力探討，豈僅曾晳獨有羊棗之嗜而已哉？蓋亦深有見於此也。此其五。

曠覽古今，橫觀中外，文化之形成與發展，既非一手一足之勞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，蓋由無量數人之心思才力，經悠久之歲月，繼繼繩繩，積聚而使然。吾人生當末世，對於文化之責任，惟在繼往開來。一方繼承文化之遺產，不使前人之心血，等諸虛擲；一方增益文化之質量，藉供後學之憑藉，日趨光榮。不然，「則凡前人之知，無以爲後學之憑藉，以益求進步，而後學所窮力盡氣以求得之者，或即前人之所得焉，或即前人之所已得而復捨者焉；不惟此也，前人求知之法，亦無以資後學之考鑑，以益求精密，而後學所窮力盡氣以相求者，猶是前人粗簡之法焉，或轉即前人業已嬗蛻之法焉。」（見蔡子民先生中國倫理學史序例）其於文化之損失爲何如也！曾公生平好學，且喜宏獎士類，大有孔子「好學不厭，誨人不倦」之風；居常舉孟子「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」之言以自警，其於文化之承受與發揚，至堪注意。吾人果欲「取人爲善，與人爲善」，爲文化界稍盡其應盡之責任，其途甚多；然檢討曾公之生平，爲作翔實之評傳，當亦其中之一。余不自量，竊欲就能力所及，爲曾公作一翔實之評傳，職此故耳。此其六。

紀載曾公生平事實較為詳細者，首推黎庶昌之曾文正公年譜，其次則為王安定之曾公大事記，又其次則為清史列傳中之曾公本傳。然大抵偏重政治軍事，所錄多為清廷諭旨、曾公奏疏，其他一切鮮有述及；讀者往往未終卷而昏昏欲睡。余因深感已往之曾公傳記，不能盡懶人意，而曾公因受長時間之考驗，其在歷史上之地位與價值，亦比較確定，遠非當時人士見解之所及；故不揣冒昧，竊欲為曾公作一新評傳，年來探討曾公之生平，頗覺不遺餘力，厥由於此。此其七。

自殷墟文字，次第開發，考古之風，一時大盛。蓋羅振玉、王國維倡導於前，董作賓、郭沫若闡揚於後，文人學子，競尚新奇，附會風雅，亦往往考究甲骨，研討故實。此種好學之態度，考古之精神，就「為學問而學問」言，絕對無可非議；惟就「為人生而學問」言，與其取數千年前之龜甲獸骨而研究之，究不若取切於民生日用之事事物物而探討之。儒家喜言倫常，惟務躬行；墨子崇尚實用，志切救世；茲生民塗炭，禮法凌夷，欲求師法，奚暇外慕？余於課餘之暇，將曾公生平，細為探討，雖迹近考古，然考古之程度，持與研究甲骨者較固自有別；至於曾公生平，惟務躬行，兼尚實用，大足為吾人之楷模，此則余所深信而不疑者。世道衰微，真儒真墨，吾已不得而見之矣。得彷彿儒墨如曾公者，特將其生平詳為評述，亦不得已也。余之所以探討曾公之生平，此其八。

上述種種，為余評傳曾公之原因。蓋無論批評人物，考察事功，瀏覽格言，研究思想，潤養德性，發

揚文化，以及閱讀傳記，從事學術，凡與曾公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，而欲對曾公有深刻之認識者，均非澈底了解曾公之生平不可。惟其如此，故余不度德，不量力，不以「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」爲慮，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爲曾公作一新評傳！

評傳曾公
之方法

緣起既明，爰述方法。

欲探討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原非易事；蓋曾公全集，凡一百五六十卷，其中除鳴原堂論文十八家詩鈔、經史百家雜鈔、經史百家簡編四書外，餘如詩集文集奏稿書札批牘雜著、讀書錄、日記、年譜等，亦將近百卷。即此而細爲探討，已不易易；何況僅此尚不足了解曾公之生平，猶須旁搜博稽耶？其爲困難，不言可喻。——此僅就搜集材料而言。至於整理材料，更非易事。蓋材料而加以整理，固非漫無系統，任意抄錄之謂；必也胸有成竹，識有定力，取捨悉得其當，批評一歸於是，並能爲系統有條理之敍述，然後名副其實，此豈淺學如余者所能勝任哉？然「有志竟成」，古有明訓，吾人爲事，固不能因其困難而不爲也。至余整理材料之方法，約分三項：

(一) 分析法 曾公一生之言行，至爲繁贅。如不條分縷析，詳爲考察，則無以闡其奧窓，明其指歸，故分析法尙焉。考分析法之爲用，在將籠統之全體分爲若干個體而研究之，其惟二之優點，在使個體之真相，容易認識，便於考察，不致爲籠統之觀念所誤。余於曾公之生活，用時間分類法；於其想

想，則用性質分類法。蓋惟其如此，而後眉目清醒，條理井然也。

(二)綜合法 僅有分析，祇能了解局部之實事，尚不足以概其全。欲不爲局部事實所囿，故綜合法尙焉。綜合法者，將分析後所得之結果，爲之綜合，以觀其會通，求其統系之法也。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既用分析法以窮其奧窓，復用綜合法以觀其會通，則洪纖畢悉，左右逢源，自可迎刃而解矣。

(三)批判法 吾人於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既能洞曉無遺，則於其生平，自可下最後之批判。批判原非易事，且易近於主觀；然倘能按諸事實，出以審慎，自不致信口雌黃，隨聲附和。且一己之見解，雖不能盡愜人意，然當其訴諸事實，立論精審，既可增一己之學識，亦足供他人之參攷，其爲益正未有艾，固不能執途人而告之，亦不必強同於人人也。

梁任公先生論讀史之方式有二：一爲鳥瞰式，亦曰飛機式的讀史方式，其方法在知大概；一爲解剖式，亦曰顯微鏡的讀史方式，其方法在知底細。前者即余之所謂綜合法，後者即余之所謂分析法。二者交相爲用，不可偏廢。

批判法有謂僅須說明，不必更下判斷，批評家即已盡職者，亦有謂除說明外，可下判斷，惟須注意歷史之價值者。前者純重客觀之事實，後者稍帶主觀之色彩。余於曾公生平，爲顧全客觀事實，多用解說，鮮用批判。偶有批判，亦當以歷史之價值爲重，絕不敢流於武斷。蓋自逞臆說，不獨厚誣前人，

評傳曾公
之目的

亦且遺誤後學，甚非治史者所宜有也。

方法既明，爰述目的。

探討曾公之生平，其原因已如上述，其目的自不難聯類而及。茲爲易於瞭解計，總括目的爲兩項：

(一)了解曾公之生活與思想　探討曾公之生平，其原因雖有多種，然其大要不外了解曾公之生活與思想耳。蓋倘能如是，則曾公立身處世之道，與乎道德學問，事業文章，在在均能了解，既不致爲片詞隻語所誤，亦不致人云亦云，無所適從也。

(二)闡明人物與時代之關係　除了解曾公生平外，其另一目的，則在表現人物與時代之關係。曾公一生，得力於時代者奚若？其所造就者又奚若？向使曾公生於別一時代，其成就是否如是？凡此種種，均非常重要，固不僅爲了解曾公生平而已。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焉。知後之人士，其評判當代之人物，不如吾輩之評判曾公耶？吾人探討曾公之生平，倘能了解時代與人物之關係，則何去何從，益能知所趨向矣，故余懸以爲鵠焉。

梁任公先生嘗云：「歷史的目的，在將過去的真事實，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，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。」（見梁著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》）錢疑古先生亦云：「居今治學，考古務求其真，致用務

求其適。」（見黎劭西先生所編宋元明思想學術文選第一輯敍例）余評傳曾公之目的，厥在於是。蓋所謂了解曾公之生活與思想，即「考古務求其真」，亦即「求得真實」；所謂闡明人物與時代之關係，即「致用務求其適」，亦即「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，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鑑。」

凡上所述，卑無高論，而其要在敍述評傳曾公之原因、方法、及其目的而已矣。名曰導言，蓋取屈原「導乎先路」之義也。

二 時代背景

人物與時
代

美國心理學家桑戴克 (Edward L. Thorndike) 嘗謂：「人生是兩重的——一重是環境對於他所生之結果，一重是他對於環境所生之結果。人之成因或稟質等於他在環境中所受的影響，與他對於環境所生的反應之意向。」（見舒新城所譯個性論）於此足見人生與環境，其關係至爲密切；欲充分認識人生，則於其所處之環境，應有充分之了解。梁任公先生云：「孟子曰：『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』」可謂至言。故欲品評一人物者，必當深察其所生之時，所處之地，相其舞台所憑藉，然後其劇技之優劣高下，可得而擬議也。」（見六大政治家中管子）蓋亦深知人物與時代環境之關係，欲品衡人物，不能不考察其時代環境也。余於評述曾公之前，首述其時代背景，職此故耳。

曾公之時
代背景

曾公之時代背景，果何如耶？

民族思想
之銷沈

時 代 背 景

一、民族思想之銷沈 清代康熙乾隆兩朝曾舉行博學鴻詞科，而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復厲行

文字之獄，故嘉道之間，所謂民族思想，已非一般士大夫所能了解。總理云：「滿清統國二百餘年，明遺老之流風遺韻，蕩然無存，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，習與相忘，廉恥道喪，莫此爲甚！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，終不明春秋大義，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，太平天國遂底於亡。」（見太平天國戰史序）洵不刊之論也。由此觀之，曾公之缺乏民族思想，殆亦時爲之也。

朝政之腐敗

二、朝政之腐敗 自乾隆好大喜功，專任和珅，朝政日弛，官常日替。嘉慶攬政，和珅雖誅，而積習已成，末由挽救。兼之教亂紛作，略無政治可言。至於道光末年，偏任滿人穆彰阿，遂致鴉片戰役，措置失當，尤足見清廷之腐敗。善夫柳翼謀先生之言曰：「自乾隆中葉至道咸間，清代內治之腐敗，達於極度，雖無外患，亦不足自保。蓋高宗習於汰侈，務爲誇大，金川緬甸安南諸役，俱以苟且藏事，而朝廷莫敢直言，相尙以欺詐蒙蔽。積之既久，如癰決疣潰，所在皆患。而繼起者復皆庸碌無能之輩，浸淫醞釀，愈引愈鉅，清之祚幾斬焉。藉非漢族出死力以維之，清之亡久矣。」（見柳箸中國文化史）

吏治之貪汚

三、吏治之貪汚 當時朝政既如是，則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所謂地方政治，自可想見。章學誠上執政言時務書，其中有云：「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，訖於嘉慶三年而往，和珅用事幾三十年。上下相蒙，惟事婪賊，積貨始如蠶食，漸至鯨吞。初以千百計者，俄而非萬不交注矣。俄而萬且以數計矣，俄而以數十萬計或百萬計矣。一時不能猝辦，率由藩庫代支。州縣徐括民財歸款，貪墨大吏，胸臆習爲寬

侈，視萬金呈納，不過同於壺餉，屬吏迎合，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，不能博其一歡。官場如此，日甚一日。（見章氏遺書卷二十九）而劉蓉致某官書亦云：「今天下之吏亦衆矣，未聞有以安民爲事者。而賦斂之橫，刑罰之濫，朘民膏而殃民命者，天下皆是！」（見養晦堂集）於茲足見清代吏治，自乾隆中葉，以迄嘉道，其貪汚之程度，達於極點。小民何辜，罹此荼毒？迫於生計，遂致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，蓋亦勢所必至也。

軍事之廢弛

四、軍事之廢弛 清代中葉以前之基本軍隊，八旗而外，厥爲綠營。入關以後，八旗兵以養尊處優，習於驕惰，悍勇之氣，日就銷沈。故三藩之役，全無效用。三藩之役而後，綠營兵雖代八旗而興，嘉道以降，亦趨腐敗。王闔運湘軍志云：「自軍興，綠營將帥，雖統率幾千調度之兵，然武器窳鈍不堪用。彼等以地方州縣之人夫，搬運其武器鍋帳，已則拱手乘車馬，徵地方之公館爲宿舍。兵卒或步行而不擔武器，徒徵發民家旅店，使居人惶怖，而恨其不去。其遇敵也，先作低矮之壘壁，居於其中，而營門之負販，則往來雜糅焉。諸將帥雖欲畫一而不能。惟滿蒙軍稍整齊，而驕傲貴倨，雖督撫不能易置。無已，多使用綠營，而其弊又如此！」王定安湘軍記亦云：「自洪楊倡亂，大吏久不習兵，綠營窳鈍驕惰，聞征調則驚號，比至前敵，秦越楚燕之士，雜糅並進，勝則相妬，敗不相救，號令歧出，各分畛域，迄不得一兵之用！」觀此，則當時軍事之廢弛，不啻目睹。嗣後楚勇、湘勇、淮勇相繼成立，蓋由於此。

財政之困
難

五、財政之困難 咸豐元年曾公曾上議汰兵疏，其中有云：「竊維天下之大患，蓋有二端。一曰國用不足，一曰兵伍不精。兵伍之情狀，各省不一。漳泉悍卒，以千百械鬥爲常，黔蜀冗兵，以勾結盜賊爲業。其他食吸鴉片，聚開賭場，各省皆然。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，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，遇賊則望風奔潰，賊去則殺民以邀功。」章奏屢陳，諭旨屢飭，不能稍變錮習。至於財用之不足，內外臣工，人人憂慮，自庚子以至甲辰，五年之間，一耗於夷務，再耗於庫案，三耗於河決，固已不勝其浩繁矣。乙巳以後，秦豫兩年之旱，東南六省之水，計每歲歉收，恆在千萬以外。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，天下財產，安得不紓？」（奏稿卷一）於此足見當時不但軍隊略無軍紀風紀可言，即政府財政，亦異常支絀，考當時財政支絀之故，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一案，實爲其主因。蓋自乾隆卽位至乾隆四十六年，庫貯已由三千萬兩增至七千八百萬兩，乾隆爲擴充軍備計，一舉而增兵六萬有奇，遂致歲費銀二百餘萬也。其時大學士阿桂曾上疏陳論，以爲國家經費，驟加不覺其多，歲支則難爲繼；此次新添兵餉，歲近三百萬，統計二十餘年，卽須用七千萬，請毋庸概增。旋以廷臣議駁，卒從增設。故至嘉道之間，帑藏大絀，曾公力主汰兵，蓋深有見於此也。

外交之失
策

六、外交之失策 清廷財政之困難，其主要原因，除增兵而外，厥爲外交之失敗，蓋自鴉片戰爭以後，清廷除割香港與英外，復開五口通商，中國從茲遂由閉關時代而入於開放時代。至英法聯軍

之役，除割地賠款外，更增開商埠，協定稅率，於是關稅不能自主，列強以利用機器之故，挾其過剩之商品，向我實行經濟侵略矣。柳翼謀先生云：「吾國歷代雖有與各國通商互市之事，然在滿清道咸以前，大都鎖國獨立，其經濟之變遷，要皆限於國內。自五口通商以後，門戶洞開，海陸商埠，逐年增開，加以交通之進步，機械之勃興，而吾國之經濟，遂息息與世界各國相通。昔之荒陬僻壤，可變為最重之都市；昔之家給人足者，多變為不平均之發展。語物力之開發，則為遠軼於前；論財政之困難，又覺迥殊于古。」（見柳箸《中國文化史》）蓋一國財政之豐紳，恆視其國民經濟之盛衰以為斷。中國既受列強經濟力之壓迫，國民經濟已有一蹶不振之勢，則財政自感困難也。然非外交失策，易克臻此？

民間之疾苦

七、民間之疾苦 咸豐元年曾公上備陳民間疾苦疏，其中所舉民間疾苦，共分三項：「一曰銀價太昂，錢糧難納也。……東南產米之區，大率石米賣錢三千，自古迄今，不甚懸遠。昔日兩銀換錢一千，則石米得錢三兩。今日兩銀換錢二千，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。昔日賣米三斗，輸一畝之課而有餘，今日賣米六斗，輸一畝之課而不足。朝廷自守歲取之常，而小民增加一倍之賦。此外如房基，如墳地，均須為納稅課，准以銀價，皆倍昔年。……自銀價昂貴以來，民之完納愈苦，官之追呼亦愈酷，或本家不能完，則鎖拏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。甚者或鎖其親戚，抑其鄰里。……二曰盜賊太衆，良民

難安也。廬鳳穎毫一帶，自古爲羣盜之藪，北連豐沛蕭碭，西接南汝光固，此皆天下腹地，一有嘯聚，患且不測。近聞盜風益熾，白日劫掠，捉人勒贖，民不得已而控官。官將往捕，先期出示，比至其地，牌保輒詭言盜遁，官吏則焚燒附近之民房，示威而後去，差役則訛索事主之財物，滿載而後歸，而盜實未遁也。或詭言盜死，斂他囚以抵此案，而盜實未死也。案不能雪，賊不能起者，事主之家已破矣。吞聲飲泣，無力再控，即使再控，幸得發兵會捕，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，臨時賣放，泯然無迹；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，要索重賄，否則指爲盜夥，火其居而械繫之；又或責成族鄰，勒令縛盜來獻，直至縛解到縣，又復索收押之費，索轉解之資。故凡盜賊所在，不獨事主焦頭爛額，即最疏之戚，最遠之鄰，大者蕩產，小者株繫，比比然也。……三曰冤獄太多，民氣難伸也。……一家久訟，十家破產；一人沈冤，百人含痛。往往有纖小之案，累年不結，顛倒黑白，老死囹圄，令人聞之髮指者！」（奏稿卷一）向來中國人民與政府之關係，不外三項：一爲賦稅，一爲獄訟，一爲綏靖。今民衆既不勝納稅之苦，而政府復不能判斷曲直，除暴安良，甚至淆亂黑白，縱暴爲惡，民衆之痛苦如何，當可想見矣。

社會之杌

隉

八、社會之杌隉 當時之內政外交，既着着失敗，故社會不安之現象，日益顯著。王益厓先生云：「明季以還，滿洲以客帝臨朝，於中原故族，自不免盜憎主人，時見嫌忌。以是牢籠摧抑，無所不至。一般以官爲生之流——所謂士大夫——劫于威，督于利，固已緘口卷舌，紛紛入彀，以相習于巽順矣。」

惟是種見不泯，積怨日深，民衆復仇之念，不能自己。故明亡而後，民間之祕密結社，借宗教迷信之力，號召徒黨以從事『反清運動』者，不下數十起；而自達教實隱爲之魁。乾嘉之際，一再發難。風靡五省，清廷竭海內之兵力，猶十年而後定，則其力量可知。其後分布蔓延於各地之『紅陽』、『青蓮』、『八卦』、『天地』（添弟）『無爲』等組合，又皆爲其支流與苗裔，則其潛勢力之大又可知……

道光季年，清廷方以鴉片之戰見挫於夙所蔑視之英夷（當時官文書習用語），舉數百年來京旗綠營積弱之實況，一旦暴露于外。而又連年凶荒，流亡載道，百姓旣無以自安，铤而走險者實繁有徒。所謂『重熙累洽』之幻局，至此已洞穿雪亮，了無實際。當時地方文武官吏，錮於乾嘉以來承平之積習，類皆苟求恬嬉，玩視民瘼，循例上計，又復相與塗澤，扶同隱徇。各地巨商富室，則更酣歌恆舞，競以豪侈相尚，以財役人，曾不少恤。於是吏治日偷，民生日蹙，貧富之界目以懸隔，而社會不安之象，遂不可掩飾矣。方是時，祕密會黨既灼見清廷統治之不足，又夙切齒于貪官土豪之壓迫，觸發之機已熟，官民衝突乃亟。（見王簪《太平天國革命史》）于此足見當時局勢，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概。

曾公與時
代之關係

觀上述所述，吾人於曾公之時代背景，當能得其梗概。就當時之情形觀之，無論軍事政治，社會人心，殆無一不呈動亂之徵象。道咸之間，洪楊崛起金田，破武漢，都金陵，縱橫十七省，延長十五年；而山東捻黨，乘時興起，亦復擾攘數省，時越數載；溯其淵源，蓋由于此。曾公以一在籍侍郎，辦團練于長沙，

初雖幾經敗衄，備嘗艱辛，卒能戡平大亂，挽回危局，倘非有其獨到之處，曷克臻此？縱爲時代環境所囿，缺乏民族思想，不克爲漢族建蓋世之殊勳；然撥亂反正，其影響于時代者，固已如江河行地，日月經天，非尋常人之所能及。至曾公何以竟能如是，吾將依次敍述之。